

自主知识构建的实践逻辑^{〔*〕}

——以凯恩斯构建宏观经济学的路径和启示为中心

赵刘洋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梳理和分析凯恩斯如何构建宏观经济学,对构建自主知识具有重要启发。构建自主知识应从主客观二元互动的基本实际出发,反思西方主流理论的前提性假设,在与西方主流理论的对话过程中重构标识性概念,从而构建起一套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体系。构建自主知识的关键意义不是确立普遍真理,而是通过反思普遍主义假定,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真实世界。

〔关键词〕自主知识;普世性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5.08.018

一、引言

当前的世界,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如何实现进一步发展都充满着新的变化和挑战。在西方,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民粹主义的泛滥,而政党分裂又使这种社会分裂进一步恶化,“政治强人”和右翼政党纷纷登场,西方代议制民主遭遇诸多挑战,世界不稳定性在增加。面对这种变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对西方体制多有批评。而中国,则处于发展道路深刻转型的关键时刻。一直被视为中国发展重要动力的地方政府竞争,因为累积的债务而激励不足,面临增长动力如何转换的问题。至于建立在劳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战略,也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的扩展,同样需要转变,基于市场主义逻辑构建的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无论是否承认,都面临着因时代变化带来的关于适用性的质疑。

当实践出现诸多新变化之时,自然呼唤理论创新,而大变局时代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的那样,“斯密的《国富论》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于该革命惹来贫富分化;凯恩斯的《通论》写于举世经济大萧条。然而,从人类历史看

作者简介:赵刘洋,法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百年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研究”(2021EKS001)的成果。

天下大势,这三段时期皆比不上中国改革开放那么重要。”^[1]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创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因为,自主知识乃是根植于实践的动态性知识,它不是将西方主流理论作为固定答案,恰恰相反,它从中国经济实践出发,通过与西方主流理论对话,反思西方主流理论的市场主义假定,重构理解中国经济实践的关键概念。因此,自主知识主要回应的是实践中那些迫切需要回答的真实问题,而不是西方主流理论所关心的问题,由于这种知识乃是随着实践而不断发生变动的,因而是一种更加符合实际的知识体系,也因此能够对实践产生深刻影响。构建自主知识不是凭空而来,需要我们回望人类思想的演进历程。本文通过分析在20世纪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如何成功开创宏观经济学,探讨开启这场经济革命的学术路径,以期为学界关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相应讨论提供启发。

二、时代问题与自主知识构建

为解释自主知识的基本特征,首先需要剖析与自主知识相对的希望确立普遍法则的普世性知识的特点,这两种知识类型所依据的世界观明显不同。目前占据重要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所秉持的乃是经典物理学体系关于无机世界的单一维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假定世界具有确定性,即认为万事万物都遵循着相应规律运行,任何物体运动都是有规可循、随着时间而连续变化的,运动状态和变化形态也是可以准确预测的,确定性既是世界的内禀属性,亦是科学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和推理依据。^[2]第二,它假定世界的运作具有普遍法则。作为经典物理学体系的创建者牛顿(Isaac Newton),发现一个关于运动和引力定律的小的方程组,它们可以解释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地球上的落体和太阳系的行星轨道中发现的神秘规律。这样一来,就消除了地球与其他天体之间的区别,在牛顿之后,只存在一个宇宙。^[3]第三,它假定人们能以演绎推理发现这种确定法则。牛顿对宇宙逻辑的解密正是从一个极其简约的运动微分方程开始的,即 $F = ma$,如果已知作用于物体的力 F 和它的质量 m ,就可以利用方程 $F = ma$ 并通过 $a = F/m$ 算出它的加速度,而加速度决定了物体的运动方式,它可以告诉我们物体的速度在下一个瞬间将会如何变化,物体的速度又可以告诉我们物体的位置将会如何变化,因此, $F = ma$ 就成为可以预测物体未来行为的先知。而牛顿最伟大的遗产在于,他证明自然中的因果关系就像几何学中的证明一样,都是利用逻辑推理的方式由一个真理得出另一个真理。^[4]经典物理学深刻影响人们关于世界运作的认知,它使人们坚信:必然能够在合理假设基础上寻求到关于世界运作的普遍法则。

因此,模仿经典物理学体系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面临着如何处理假设和真实之间矛盾关系的问题。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市场主义假设,将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简化为一套完全理性框架,从而构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法则。这种框架以完全信息为前提,将人类经济行为放置于这种理性框架中,创建了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边际分析和制度分析等一系列方法,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构建起精美的理论大厦。^[5]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世界并不具有无机世界那样的高度确定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学的研究路径无法完全复制经典物理学。与物理学相比,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并非建立在确有其物上,功用、需求量、均衡、极大化等概念皆属于假说和空中楼阁,经济学假设的非真实性更加明显。^[6]要确立普遍法则,经济学被窄化为一门仅是关于经济要素逻辑关系的学问,构筑模型无论是用于说明经济机制,还是帮助人们进行定量计算,其采取的都是关于无机世界的工程学方法;同时,由于假设的非真实性,经济学家自然就要在概念逻辑一致性方面付出更多努力,希望从逻辑层面证明市场主义假设的合理性,但这带来的明显问题是,概念越来越精致化的理论却与

真实的经济世界越来越远。

与建立在单一维度世界观基础上的普世性知识不同,自主知识乃基于人与客观世界紧密互动的基本实际,二元互动的实质主义世界观才是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实际的理念。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医学界广泛采用的“合理推测”思维,则是一种更加适合探究人类社会实态的研究路径,这种思维是和具有明确前提设定的演绎逻辑不同的思维,它不是基于预设定义进而构建一种绝对真实,同时,它与在实验室重复试验以达到完全肯定的归纳也明显不同,“合理推测”思维是在面对有限经验证据的实际中,经过严谨探索而达到较高概率准确性和真实性,其对错则呈现于治疗之有效或无效。^[7]自主知识强调的是对主客观互动中生成的实践性知识的概括,它关注的是主客观二元互动的基本实际,而不是基于先入为主的理性主义假设以构建普遍法则。

可以看到,自主知识与普世性知识属于两种明显不同的知识类型,自主知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自主知识是在具体经历和实践中自下而上产生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由人脑通过抽象思维和理性主义假定而创造的普世性知识;其次,自主知识是弱理性的、高自发性的,行动者在获取这类知识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思考,而是通过实践活动自然习得而来,这种知识是变化且具有弹性的,是随着情势发展而不断调整的知识。^[8]概括而言,自主知识不像普世性知识那样建立在主观假设基础上,它是在具体情境中生成的,具有自发性和弱目的性,同时也是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实际的知识。

由此角度而言,回顾凯恩斯构建宏观经济学的经历,对我们构建自主知识具有双重启发:一方面,凯恩斯直面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机制,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主义假定,从而构建起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凯恩斯同样追求构建普遍法则,而随着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经济滞胀”问题,凯恩斯学派却对此无能为力,因此逐渐被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取代。这种经历也深刻提醒我们,构建自主知识的关键意义在于,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真实世界,而不是违背真实以确立普遍法则。

1929—1933年“大萧条”深刻影响全球政治格局,同时也对凯恩斯构建宏观经济学理论产生直接影响。面对数千万人员失业,西方主流理论却无能为力。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曾在其所著的关于凯恩斯的经典传记中,针对凯恩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分歧敏锐地评论道:“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做出选择的逻辑,而凯恩斯经济学所关注的则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做出选择的逻辑……凯恩斯称之为‘储蓄偏好’的行为主要源于对将来的担忧,而不是对将来生活能够过得更好的憧憬,投资也不再以理性的算计为主要动力,而是被‘动物本能的精神’所驱动。”^[9]而凯恩斯撰写《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直接目标就是找出“大萧条”期间波及所有发达国家的大量失业现象的起因。

凯恩斯希望诊断资本主义体制的关键弊病,从而找到能够挽救资本主义体制的办法。他无法认同当时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两种反应:一种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另一种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纳粹德国的复苏计划混杂着太多的帝国主义目标和为实现复苏所采用的恐怖手段,因而对凯恩斯没有吸引力,尤其是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令他感到义愤填膺,他积极参与帮助因躲避迫害而出逃的德国学者;另一方面,凯恩斯也无法接受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出现的危机使得左派中的很多人相信,社会的进步已经发展到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的阶段,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指出一个方向,但是凯恩斯并不认为苏联会成为西方文明的真正知识源泉。^[10]作为在经济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凯恩斯意识到,必须寻求能够拯救资本主义的方法。

在这种情形下,凯恩斯将目光放在当时美国正在推行的“罗斯福新政”上。在他看来,华盛顿而不

是莫斯科,才是世界经济的实验室。在他给美国政治经济俱乐部所作的演讲中,首先介绍了“有效需求”理论的概要,美国人在英国人之前就聆听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1]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一些学者开始激烈批判“罗斯福新政”。比如经济学家基恩(Gene Smiley)认为,新政计划损害了经济效率,破坏了资源再分配和产权制度,总之,“罗斯福新政”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失败典型,改革举措打压了美国“大萧条”中的投资和经济复苏。^[12]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以新自由主义理念来否定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合理性。基恩的上述观点遭到著名学者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强烈批评。在曼看来,像基恩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天真幼稚的,如果“新政”没有干预财产权利或没有为大多数美国人提供安全的生活保障,美国资本主义一定会遭遇更加糟糕的经济衰退,资本主义将失去合法性,“新政”使得民众在政治公民权上又获得了社会权利,从而巩固了美国的民主体制。^[13]显然,经济体制效率和政治认同从来就是紧密相连的,正是“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政治经济体制,而凯恩斯的理论亦是对“罗斯福新政”的论证。

因此,凯恩斯希望构建一套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破除当时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迷信。对凯恩斯来说,这种理论必须为那些一直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既定结论和寻求另一条道路的本能直觉间摇摆的经济学家们提供更加清晰的框架。^[14]当时关于大萧条问题的主流诊断分析是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完成的,按照这一学派的说法,危机仅仅源自过度投资和资源错配,为了应对危机,必须采取一系列清算措施,即一方面需要降低实际工资,另一方面必须对投资失败的企业进行惩罚。然而,降低实际工资的措施并未能像理论论证的那样阻止大萧条进一步蔓延,因此,经济学家开始质疑放任原则,并思考是否应该让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凯恩斯试图通过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支持模糊的直觉,从而破除经济学家们心中的矛盾,这个体系便构成了后来《通论》的主要内容。^[15]在凯恩斯看来,放任经济的致命错误在于,消费相对于收入会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货币的功能和目的上,其产生的结果是,这种市场体制易于遭受长期衰退的打击,如果能够通过政策引导人们花费他们能够生产出来的数量,那么这个现行体制就能被保存。^[16]可以看到,凯恩斯在经济学上是激进派,但在社会目标上却是温和保守派,他提出,要弥补放任经济的缺陷,必须采取政府干预,干预的目的不是要摧毁市场体系,而是要使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17]通过诊断放任体制的关键弊病,从而挽救资本主义体制,是凯恩斯写作《通论》的关键意图。

由此可见,凯恩斯对资本主义体制具有深刻认同。作为一位出生成长于英国精英家庭,且一贯俯视这个世界的凯恩斯来说,资本主义尽管存在缺陷,但它依然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而“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社会反对情绪会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只有正确分析问题,才有可能把疾病治愈,与此同时又保存效率和自由。^[18]因此,凯恩斯构建宏观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希望能以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解释当时世界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这种雄心亦使凯恩斯在其著作中充满一系列自信表述。

因此,当人们对经济前景深感迷茫时,凯恩斯却已经对构建的理论的预期影响充满强烈信心。1935年1月,凯恩斯在给著名文学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回信中,对自己正在写作的《通论》这样评论道:“我正在撰写一本经济理论著作,自认为它将产生革命性影响,在总体上改变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当然,依我所见,这样的影响不是立刻出现,而会发生在今后的10年的历史进程中。一旦我提出的新理论被人充分吸收,与政治、感觉和激情结合起来,我无法预测它最终将会对人们的行为和事务产生什么样的结果。”^[19]凯恩斯的确实实现了他的意图,经济学家往往把《通论》的出版作为宏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20]当市场主义理论在现实困境中无能为力时,主张通过国家干预以解决失业问题的凯恩斯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更广阔的视野而言,亦是时代成就了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

从此点而言,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自主知识应该关注实践中那些迫切需要回答的真实问题。对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重要问题的解释,不是将西方主流理论作为答案,而是依据事实对西方主流理论依赖的既定预设进行深入反思,以此构建更加符合实际的知识。

三、既定假设的重构与自主知识构建

当我们分析一种理论的不足时,通常会有以下方式:说明既有理论在推导结论中所遵循的逻辑矛盾;指出既有理论所依赖的假设明显不重要或错误;提出既有理论的结论与经验现实明显不符;指出新的理论比既有理论能够更好解释经验现象。^[21]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需要依据现实深入反思普世性理论的既定预设,主要是因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通常不会在内部逻辑上明显矛盾,或者假设明显错误,因此,构建自主知识的主要途径则是指出既有理论无法更好地解释新的重要事实,通过重构假设构建能够更好解释实际的理论。

为何普世性知识始终无法脱离假设?这和此种类型知识希望确立普遍法则紧密相关。在张五常看来,事实无法解释事实,甲现象发生连带着乙现象发生,如果我们据此就说甲解释了乙或者乙解释了甲,那么就会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数之不尽的现象规律如果真的能够自我解释,那么在任一科学之内,理论必然汗牛充栋,没有一般性解释力;其次,有规律的现象在不同的情况下,其规律的表现可能会改变,如果以有风来解释羽毛上升,那么如何解释有风而石头却不上升呢?所以,一种科学理论要想具有普遍解释力,就必须将现象分门别类进行系统安排。^[22]问题在于,任何分门别类和假设都是对复杂的现实世界的简化,而实践中那些与既定理论假设明显不同的重要事实,就为重构既有假设提供重要基础。

凯恩斯构建宏观经济学所采取的就是此种方式。他希望通过解释当时新古典经济学无法真正有效解释的大量失业问题,重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失业的基本假设,而这种重构则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是新的理论中的一种特殊状态。要实现这一目标,凯恩斯首先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性假设的剖析出发。在凯恩斯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存在明显局限性,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点,不能代表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持有的属性。新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第一,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也就是说,一个就业的人所得到的工资等于就业量减少一人所损失的产值;第二,每一个就业者的实际工资正好足以诱使实际就业的人继续维持原有的就业数量。因此,就业的资源数量系由这两个假设前提所决定,第一个前提提供就业的需求曲线,第二个提供就业的供给曲线,而就业的数量则决定于边际产品所带来的效用等于边际就业所带来的负效用之点。^[23]但是,凯恩斯认为,古典学派的两种失业范畴无法概括全部失业现象,当时有大量的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工作,但却无工可做,这该如何解释?

作为一名货币理论家,凯恩斯以其敏锐的专业直觉认识到,问题出在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区别上。在凯恩斯看来,现行的货币工资不一定能准确地衡量劳动者的边际负效用,降低现行的货币工资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劳动者退出就业市场,但如果工资品价格上升,以致现行货币工资所能购买到的工资品较之前更少时,却不一定导致同一后果。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这不会改变其结论,但凯恩斯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劳动的供给函数不把实际工资作为它的唯一自变量,那么新古典经济学的论点就会完全崩溃,从而使实际的就业量不能得以确定,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其非常特殊的假设条件是分不开的,不能处理更加一般的情况。从经验层次上而言,作为经济萧条特征的失业是由于劳动者拒绝接受货币工资削减的论点,明显无法获得事实的支持。因为经验表明,在劳动者既没有明显改变最低

实际工资要求,又没有明显改变他们的生产率时,却存在着巨大的就业量变动。^[24]对凯恩斯来说,上述这种假设带来的明显问题是,它否定第三种失业类型即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

而在凯恩斯看来,这种非自愿性失业状态才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失业类型。此类失业状态是指,当工资品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作出微小上升时,为了现行货币工资而愿意工作的劳动供给量和在同一货币工资之下对劳动的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的就业量,那么这时便可以说,人们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对凯恩斯而言,新古典理论仅适用于充分就业,把它应用于非自愿失业明显错误,而古典学派的理论家很像置身于非欧式世界的欧式几何学家们,除非建立非欧几何,没有什么别的出路,类似的事情也要求今天的经济学者去做,需要推翻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个假设前提,并建立一个使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成为可能的运行方式的理论体系。^[25]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希望构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以使新古典理论成为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中的特殊情形。

那么,凯恩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就需要将目光转至该理论的内部,分析凯恩斯如何构建宏观经济学框架,由此亦可以看到标识性概念在自主知识构建中的重要地位。

四、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构建

对既定假设进行深入反思,目标是建构标识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在自主知识构建中占据重要位置。标识性概念应该具有三种基本特征:第一,它是对重要的经验事实的概括;第二,它是在反思既定假设基础上形成的概念;第三,它应能清晰概括出新的理论框架中的中心议题。从此角度而言,“有效需求”正是凯恩斯构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标识性概念。

针对当时普遍出现的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市场体制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才是造成失业的关键原因,凯恩斯以此概念为中心,深入剖析资本主义体制的关键弊病,从而构建起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凯恩斯对资本主义体制弊病的剖析,从最直接的问题出发:为何会出现失业?直接原因当然是企业不去雇用那么多的工人。那么,企业为什么不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在凯恩斯看来,这是因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其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要实现最大化目标,企业家会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生产规模,这就决定了企业所能提供的就业量的大小。如果把一定数值的就业量造成的总收入(即要素成本+利润)称为该就业量的产品卖价,对企业家而言,每一数值的就业量都有一个最低预期卖价,如果卖价低于此最低数值,他便不会提供与之相对应的就业量,而最低卖价就是相应的就业量总供给价格。在技术、资源和每一单位就业量的要素成本均为既定时,每一个厂商和行业以及社会总就业量取决于企业家对该就业量的产品所预期的卖价。因此,企业家会致力于把就业量维持在能使预期的卖价超过要素成本的部分为最大的水平。^[26]那么,对失业问题的解释和凯恩斯理论框架中的关键概念即“有效需求”又有何种关系?

其核心在于,就业量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函数。所谓“有效需求”,即令 Z 为雇佣 N 个人时的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则 Z 和 N 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为 $Z = \Phi(N)$,该公式可称为总供给函数;同样,令 D 为企业家雇佣 N 个人时所预期的卖价,则 D 和 N 的关系可以写为 $D = f(N)$,该式可以称为总需求函数。当 N 的数值既定,如果预期卖价大于总供给价格,那么企业家就会有积极性将就业量加到大于 N ,如有必要,企业家还会在相互竞争中购买生产要素从而提高成本,直到 Z 和 D 相等为止,这样就业量被决定于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而“有效需求”就是指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相交时 D 的数值,此时企业家的预期利润会达到最大化,古典理论假设总需求价格永远同总供给价格相等,但实际上“有效需求”不是只有唯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一系列的无穷多个同样可被容许的均衡值。^[27]由

此,凯恩斯通过“有效需求”概念构建起一个关于就业的动态性理论框架。

这一动态性理论框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性框架明显不同。就业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这却是凯恩斯所着重考虑的问题。在凯恩斯看来,在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既定的情况下,只存在一个均衡水平的就业量,因为任何其他水平都会导致全部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之间的差异。均衡水平的就业量不能大于充分就业,即实际工资不能小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但在一般情况下,也没有理由来期望均衡水平的就业量等于充分就业。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有效需求”则是一种特殊事例,只有当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之间处于一种特殊关系时,“有效需求”才能得以实现。这种相当于古典理论的假设条件的特殊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最优的关系。然而,只有在偶然的场合或者通过人为的策划,使现期的投资量对需求所提供的数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所造成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大于社会在充分就业时所愿意有的消费量的部分,上述最优关系才能成立。^[28]在这套理论中,各种变量之间彼此相连,围绕“有效需求”概念,凯恩斯为宏观经济学搭建起基础框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是自变量,而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就业量和国民收入则为因变量,所有的这些变量都处于动态过程中,通过经济预期的引入,凯恩斯深刻改造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性框架。

尤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以就业量作为因变量,分析就业量如何受到三个自变量即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以及利息率的深刻影响,从而在解释当时出现的严重失业问题过程中,搭建起一套影响深远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率部分地取决于既定因素,又部分取决于不同种类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而利息率部分取决于流动性偏好的状态,又部分取决于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货币数量。由此,最终的自变量包括以下几个因素:基本的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对流动性的态度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的估计,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讨价还价所决定的工资单位,以及中央银行的行动所决定的货币数量。当上述因素具有既定值时,这些变量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量。而根据边际消费倾向得到的投资增加量,和与它相对应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量之间的比例,可由凯恩斯在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用于衡量投资变动对国民收入放大效应的投资乘数加以表明。如果假设就业乘数等于投资乘数,就可以用投资乘数去乘由上面已经说过的各因素所决定的投资的增加量或减少量,以便推知就业的增加量。就业量的增加或减少会提高流动性偏好曲线,这样就业量的增加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而经济制度中的实际现象也由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特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9]凯恩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将预期和货币引入经济理论,明显深化了我们关于真实经济世界运作的认知,深刻改变了那套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静态性理论。

从发展方向而言,凯恩斯这套框架则逐渐从学术理论向学科转变,而如何实现学科化,应是自主知识构建的重要目标。凯恩斯的理论框架在被希克斯(John Hicks)以简洁的公式重新表述,又经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完善后,建构为清晰简洁的IS-LM模型,这一模型再经计量经济学家克莱因(Lawrence Klein)和戈登伯格(Robert Gordon)的实证检验后,真正实现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向宏观经济学转变。^[30]纵然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退出历史舞台中央时,作为经济学一门分支学科的宏观经济学仍可见于几乎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教材,凯恩斯的学术贡献显然是知识构建的成功范例。

五、自主知识与普世性知识关系再思考

回顾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学界的命运变迁可以看到,自主知识的活力在于其开放性,而不

在于确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自主知识根植于实践,这就意味着,当实践发生变化,自主知识同样可被争鸣、反思和重构。只有如此,自主知识才具有长久生命力。凯恩斯的这套理论在西方学界的境遇变迁,启发我们认知思考构建自主知识的关键意义:自主知识主要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真实世界,而不是违背真实以确立普遍法则。

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理论面临诸多冲击,一方面,这和美国社会出现的系列变化有关:首先,政府使用财政政策来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但是这种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未成功;其次,社会福利支出的大爆炸;再次,越南战争经费扩张造成通货膨胀,结果就是全球过量需求不断增长,政府采用预算赤字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大幅度增长带来全球需求不断上扬,而政府利用货币政策应付工会推动的工资增长,无约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带来经济周期里持续的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率上涨;又次,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在1971年崩溃,1974年能源价格上涨四倍;最后,政府试图控制物价和工资因为工会强势反对而失败。人们将这些灾难皆归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31]社会现实的变化带来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凯恩斯经济理论却无能为力,因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开始在西方经济政策领域和学术界迅速扩展。

另一方面,这种境遇的变化和凯恩斯希望确立普遍法则的追求有着重要关系。凯恩斯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主义假设过于特殊,因此希望构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然而在卢卡斯(Robert Lucas)看来,凯恩斯同样未能考虑到一个基本事实:个体在作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变量,还会对这些变量将会出现的情况作出相应的预期,“理性预期”使得以国家干预来解决经济周期问题的相应举措往往是无效的。^[32]卢卡斯对《通论》的批判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凯恩斯为解释更简单的短期非自愿失业问题,放弃构建完整经济周期理论这一初衷;其次,凯恩斯放弃市场出清假设和均衡原则,这一原则意味着市场主体能够作出最优决策;最后,凯恩斯理论中充斥着未被良好定义而且基本无用的概念,特别是非自愿失业和充分失业这两个概念。^[33]因此,卢卡斯希望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反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卢卡斯而言,经济学应以精确模型来表达,而不是像凯恩斯那样仍然使用模糊的概念和表达方式,尤其是面对西方社会出现的“经济滞胀”,凯恩斯理论对此无能为力,这使卢卡斯彻底放弃对凯恩斯理论的认同,转而希望构建一种新的理论取而代之。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卢卡斯和凯恩斯主义的关键分歧在于:宏观经济学是否应该放弃个体主义方法论。对卢卡斯而言,凯恩斯主义计量经济学模型在不同经济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和评估方面完全失败,因为依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构建的计量经济模型普遍假设模型的估计系数独立于政策机制,而经济主体在面临政策机制变化时会相应改变自身的决策,对于任何一个用来估计某种特定经济情形占据主导地位时的经济模型,其所能获取的信息一定是不充分的,也就无法用来估计不同的经济情形之下会出现什么情况。^[34]事实上,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对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个人追求自我利益会自动实现社会利益这一理念的明显挑战,即使没有西方20世纪70年代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经济困境,这种理论也不是西方主流所欢迎的学说。

凯恩斯希望从真实世界出发以建构理论,这明显不同于从市场主义假设出发以确立普遍法则。后者将假设建立在完全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被视为一种极端事实,它因为过于特殊而无法包含一般,这就导致高度形式逻辑化的理论往往成为和现实世界无关的逻辑推演。相反,从真实世界出发以建构理论,依据事实以修订假设,能够使对现实世界的分类更加趋于一般性,从而扩展理论的解释范围。

但问题在于,经济世界并不具备无机世界那样的高度同质性,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抉择也不可能

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差异性和个体选择则带来经济世界的复杂多样。凯恩斯虽然正视经济世界的复杂性,但其目的依然是希望在确定性信念基础上构建普遍法则。然而这种认识论在实践中存在明显问题:

首先,个体抉择将带来经济实践的不断变化,若将理论扩展至任何情形,自然导致诸多问题。凯恩斯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主义假设过于特殊,因此希望构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但在卢卡斯看来,凯恩斯主义计量模型普遍假设模型的估计系数独立于政策机制,然而待估参数会随着政策变量的变化而变化,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对评价不同经济政策的具体效果毫无帮助,它们的简化形式将内生变量即经济政策的变化敏感转化为外生变量,同时,由于它们将自身局限于研究经济主体的历史决策,因而未能更深入地探究经济主体目标函数。^[35]如前所述,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的“滞胀”问题,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逐渐失灵,并逐渐被“理性预期学派”所取代。

其次,经济解释本身无法脱离价值预设。直到今天,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崩溃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依然是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凯恩斯理论只是其中一种代表性解释,另有一种代表性解释是弗里德曼与施瓦兹(Anna Schwartz)的货币主义解释,即强调从货币紧缩到政策不力,导致银行系统持续危机,最后出现价格和产出下降;还有一类解释如特明(Peter Temin)等学者则认为大部分的货币紧缩实际上是货币对产出的被动反应,主要根源在于消费持续且明显下滑;而之后的经济学家则更多利用多个国家金融数据来解释这场危机,他们认为货币冲击是最重要的原因,货币冲击通过金本位制传至多国。^[36]经济解释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难以建立起适用任何情形的普遍法则,人们无法获得绝对事实,经济学家都是基于既定预设进行相应解释。差异性和不确定性视角的引入对主流经济学有所修正,但是,这些希望寻求普遍法则的研究路径同样面临诸多问题。

有意思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并蔓延至世界后,人们又开始重新认真对待凯恩斯的理论,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明显问题。历史正是在这种看似循环的轮回中不断向前,而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是经济学理论中需要面对的永恒难题。

六、方法与启示

尽管中西学界具体情境不同,凯恩斯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解决思路也和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存在诸多差异,当然无法将其构建宏观经济学的经验与构建自主知识简单类比,但是,梳理凯恩斯如何构建宏观经济学,对我们思考如何依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这种启发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自主知识构建奠定重要基础。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经济治理中心负责人什韦纳尔(Jan Svejnar)曾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比较,在他看来,“中国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和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在1989年以后的经济转型,为比较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不同路径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背景……在中国,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超出大部分人的预期。但在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中,在转型后的3—8年的时间中,经济出现了急剧的、不可预计的衰退,随后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方法,并且受益于明智的政策,还相对避免了负效应的冲击。”^[37]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基本预设,即私有化是经济增长的前提,那么,该如何解释与西方资本主义明显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重构既定基础性假设提供重要契机。如前所述,经济学中的假设往往意味着对纷繁复杂的实践的高度简化和理想化,不可能包含所有情形,而实践则是不断发展和变化

的,实践中新的重要事实会与既定假设明显矛盾,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依据重要事实重构假设。西方主流理论无法解释为何符合其理论预期的“休克疗法”带来的却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林毅夫对此强调,经济研究应该放松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这将有助于重新定义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中国市场转型不是立刻消除价格扭曲,而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逐渐减少国有企业补贴需求,并消除政府价格扭曲和行政分配,以及对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中的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正是通过这种谨慎和渐进的方法,使得中国在保持稳定的过程中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38]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私有产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彻底私有化改革,经济回报就会受到政治掠夺的支配,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却与西方主流理论形成鲜明对比。在钱颖一等学者看来,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还是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对其所管辖的经济事务所具有的主要控制权等诸多方面,这种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性因素。^[39]因此,依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重要事实,修订甚至推翻西方主流理论的既定预设,往往带来理论的重要创新。

第二,依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通过深入反思普遍主义叙事,会使中国在现代化叙事中真正获得主体性。目前占据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叙事主要是西方在“冷战”时期构建起来的,这种叙事将任何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现代化探索通通视为“反现代化”的歧途,如今已经严重限制人们关于现代化的认知和探索。比如,罗斯托(Walt Rostow)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其副标题即是“非共产党宣言”,对罗斯托而言,现代化理论远远不仅是一种学术模式,它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进程的手段,从而帮助美国推进和引导全球变迁。^[40]普遍主义现代化叙事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具有影响力。比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曾被广泛讨论,“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一种普世性现代化叙事,它希望从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进程中寻找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并将现代化视为具有明确终点的连续过程,而现代化范本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41]在国际社会科学领域,以科尔奈(János Kornai)、塞勒尼(Ivan Szentenyi)和斯塔克(David Stark)为代表的学者,以东欧国家的转型经验为基础而构建的新古典社会科学理论,曾经引起国际学界瞩目,但这些关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研究延续的依然是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念。秦亚青曾将社会科学知识类型区分为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理解两种知识类型的差异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他看来,表象性知识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导型知识论观点,这种知识主要来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二元主义以及因之产生的理性主义传统,这种话语占据强势地位,基于非西方社会所构建的理论首先就被限制在西方主流理论框架和假设范畴中。与表象性知识不同,背景性知识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情势发展而不断调整。^[42]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则意味着对具体情境中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展开深入分析,从而获得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

因此,依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构建自主知识,将对西方那种带有强烈排他性的形式主义认识论形成明显冲击。从柏拉图(Plato)到笛卡尔和康德(Immanuel Kant)等,这些最具代表性的西方思想家们皆主张将世界区别为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比如康德就强调,我们无法认识本体世界,只能认识现象世界;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传统则主张,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基于理性对客观世界所构筑的知识,亦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基于理性抽象所构筑的知识必定是脱离于具体环境的普遍性知识。^[43]希望寻求经济世界普遍法则的主流经济学延续着的正是这种思维,它从主观设定的理性人假设出发,依据演绎逻辑而将复杂的经济现实建构为具有确定性的竞争性市场体系,进而认为这一体系必定能够带来供

需均衡、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持续的经济发展。^[44]这种带有明显普遍主义特征的认识论,实质上是通过模仿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而将真实世界演绎为一套抽象形式法则,它以主观假设而将人类行为剥离于具体情境,并希望由此确立普遍真理,而构建自主知识将对形式主义认识形成明显冲击。

第三,依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构建自主知识,则意味着应以开放性视野关注实践中的变化和挑战,而理论构建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探索。今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只手”即地方政府和市场都出现诸多挑战。地方经济对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也未能有效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房地产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带来GDP增长,但是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会推高房价,催生房价泡沫化风险,一旦房价泡沫破裂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会将生产性资本挤出而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尤其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借助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融资,从而导致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长期内债务的过快增长将导致负债主体的偿债压力过重,可能触发大规模债务违约,引发经济与金融危机。依赖这种发展方式带来的显著问题就是贫富差距一直未能得到妥善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长期位于0.4以上,财产基尼系数更在0.7以上。贫富差距直接表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偏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2019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三分之一左右,社会结构趋向于“金字塔型”的失衡结构。^[45]地方政府竞争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在提高经济安全性以及解决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等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同时,作为“另一只手”的市场,中国经济增长依赖的两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明显动力不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均陷入长期低增长状态之中,这就导致外部需求减少,“出口—投资”联动机制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减弱,资本积累增速放缓;受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与企业债务问题以及民间投资积极性减弱等因素影响,国内投资需求较为疲软,拖累资本积累增速;劳动方面,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深化,劳动供给增速下降,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将更加显著。^[46]在这种情形下,构建自主知识应该依据高度开放性的研究进路,这同样与希望建立静态性理论框架以确立普遍法则的进路明显不同。

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不同于希望确立普遍法则的关键之处在于其正视人类社会与无机世界存在根本差异。与那种努力模仿经典物理学体系的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构建自主知识关注人类社会本身的特性。人间世界充满主观性、多元性和偶然性,这就需要通过主观与客观、多元与一元、偶然与规律间的互动来理解,它立足于经验证据之上的归纳,应用演绎逻辑从中导出可靠的推断与假说,然后再返回到经验世界中去检验,这应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47]构建自主知识应该直面实践中的矛盾性现实,并由这种现实出发以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

七、结 语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扎根于实践。凯恩斯构建宏观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希望解释经济危机,他不是固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教条,而是依据实践对现有理论进行更新,而当历史发生新的变化,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样被反思和重构。因此,构建自主知识应该关注实践中的真实问题和紧迫性问题,正视实践中的复杂性现实,并由这种现实出发,通过与现有理论对话,反思既定假设并重构理解中国的标识性概念,而这种理论体系同样需要不断被反思、争鸣和重构。

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与希望确立普遍法则的普世性知识明显不同。它不是从假设出发进而构建普遍法则,而是从主客观二元互动的实践中概括行动者的真实行为逻辑,这种研究进路才是与真实人类社会更加趋于一致的进路。事实上,只有求真求实的学术,才能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只有扎根于实

践的自主知识,才会具有长久生命力。

注释:

- [1]张五常:《科学说需求》,《经济解释》卷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序”,第20页。
- [2]秦亚青:《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以三大理论批判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 [3][4][美]史蒂夫·斯托加茨:《微积分的力量》,任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267-268、268-269页。
- [5]何大安:《西方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边界拓宽及局限性》,《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 [6]张五常:《科学说需求》,第257页。
- [7][43][44][美]黄宗智:《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 [8][42]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 [9][10][11][16][17][31][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储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88、559-561、566、558、558-559、901-902页。
- [12]Gene Smiley, “A Note on New Estimat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1920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0, No. 4, 2000, pp. 1120-1128; Gene Smiley, “Recent Unemployment Rate Estimates for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3, No. 2, 1983, pp. 487-493; Gene Smiley, *Rethink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Chicago: Ivan R Dee, Inc. 2003.
- [13][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下)》,郭台辉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第376-377页。
- [14][15][20][30][33][35][比利时]米歇尔·德弗洛埃:《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房誉、李雨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4-5、4、25-27、171、173、174-175页。
- [18][22][23][24][25][26][27][28][29][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97、7、11-12、16-17、19-22、29-30、30-33、34-35、52-57、113-115、140-145、257-263、254-258页。
- [19][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凯恩斯文集》第13卷,严志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3页。
- [21]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 [32]Robert Lucas, “Nobel Lecture: Monetary Neutr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4, No. 4, 1996, pp. 661-682.
- [34][比利时]米歇尔·德弗洛埃:《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第174-175页;[美]小罗伯特·E. 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朱善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页。
- [36]Ben Bernanke,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27, No. 1, 1995, pp. 1-28.
- [37][美]扬·什韦纳尔:《中国的转型表现:一个与其他转型经济比较的角度》, [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 [38]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典藏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2-136页。
- [39]G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1995, pp. 50-81.
- [40][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 [41][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代序”,第10、20页。
- [45][46]刘伟、陈彦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 [47][美]黄宗智、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责任编辑:刘妹媛]